

# 二重的忠誠

## ——白壽彝與開封的故事

• 王 柯

### 一 回到共同體

1932年秋天，以數篇研究朱熹哲學思想的論文修完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白壽彝(1909-2000)回到了故鄉開封，其初衷大約是想在離家不遠的國立河南大學謀一教職。到1935年回到北京之前，一直生活於開封的白壽彝對自己的學術研究方向做出了一個重大調整：徹底放棄「寫出一本超過前人的(中國)哲學史」的夢想，開始集中精力研究「中國回教史」。毫無疑問，正是由於這一調整，使白壽彝得以在群星燦爛的中國歷史學界中獨樹一幟，奠定了日後成為中國史學大家的基礎。我們從此首先可以確認，開封的社會文化氛圍在歷史學家白壽彝確認「自我」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國家、民族和文化，或許不過是同一存在的不同層面；然而，對於出生於穆斯林家庭、成長在一個具有相當規模的穆斯林共同體中的白壽彝來說，它們卻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存在。因為如果按

照現代國民國家理論的思路來理解的話，在認同的問題上，一個平凡的穆斯林和一個中國史學大家，二者簡直無法放在同一個起點上進行考慮。但是白壽彝在回到開封之後，卻很容易地邁過這道「樊籬」，毫無疑問，通過社會學的視點觀察「白壽彝與開封」的範例，有助我們更深刻地理解中國傳統的地域社會構造與近代中國的國家、民族和文化認同之間的關係。

1997年12月末，筆者首次拜訪了神往已久的歷史學家白壽彝<sup>①</sup>。翌年8月，筆者利用了四天時間在開封踏尋白壽彝的思想軌迹。就像美國學者柯文(Paul A. Cohen)在其《知識帝國主義——東方學和中國形像》(即*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的日譯本)一書中指出的那樣：「決定一位歷史學家採用一定的方法、以及他們提出這樣或那樣的問題意識，其理由除了他自身所處的社會、文化環境之外，別無它物。」<sup>②</sup>白壽彝之所以能夠在認同問題上保持從一個平凡的穆斯林到中國史學大家的巨大跨度，也同樣可

如果按照現代國民國家理論的思路來理解的話，在認同的問題上，一個平凡的穆斯林和一個中國史學大家，二者簡直無法放在同一個起點上進行考慮。但是白壽彝卻很容易地邁過這道「樊籬」。開封的社會文化氛圍在歷史學家白壽彝確認「自我」的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 本文曾經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召開的「思想史上的認同問題：國家、民族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2005年10月13日至14日)上宣讀。

以從他與開封城的關係中找到答案。首先，我們可以看出，從開封的居民結構以及城中伊斯蘭教的歷史和規模來看，1932年白壽彝所回到的那個開封，可以讓他蘇醒自己對穆斯林共同體的認同意識。

開封有一個「順河回族區」，在開封市五區中面積最大、人口最多。順河回族區裏有一個「清平辦事處」，被稱為「全市唯一的少數民族辦事處」，現有居民約1.9萬人，其中回族佔46%。清平的回族佔居民人口比例之高，在全國城市中實屬罕見。開封市內共有二十座清真寺（男寺十三、女寺七），其中十三座（男寺八、女寺五）在順河回族區內，而清平辦事處轄區內又集中了其中的八座（男寺六、女寺二）。因為開封市內的清真寺大多集中於清平這一區域內，估計1949年之前居民中的回民比例還會更高。按照今天這個地域行政區劃來看，30年代白壽彝回到開封時的故居，就在順河區清平辦事處所轄區域內。

東大寺是清平地區也是開封市內規模最大的清真寺，開封市伊斯蘭教協會就設在東大寺裏。據東大寺內康熙二十八年（1689）的「重建清真寺碑」記載，東大寺建於唐代貞觀二年（628）。不過，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622年才在麥地那創建了伊斯蘭教團國家，630年才征服麥加，碑上說法不足採信，但是東大寺具有悠久歷史卻不容置疑。明代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的部下、回族將領常遇春佔領開封後，為了進攻北京在當地招兵買馬，許多回族青年應徵入伍。據說這件事感動了朱元璋，他從南京趕到開封，親自給東大寺贈送了「精忠尚武」的匾額。

白壽彝所居住過的維中前街，距離東大寺只有百數十米的直線距離。

這也印證了開封市伊斯蘭教協會會長李文章的白壽彝「本家」就在東大寺「坊上」的說法。「坊」，即「教坊」，也稱「寺坊」。教坊是回族社會特有的組織方式，它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唐宋時代的「蕃坊」<sup>③</sup>，本來是以一座清真寺為中心，由同在此禮拜的回族居民所自然形成的地緣社會組織。教坊與清真寺，實際上互為因果。清平地區內回民比例之所以高，與回民的「一寺一坊」或「一坊一寺」的居住習慣有關。伊斯蘭教是維繫坊的根本，在伊斯蘭教的信仰下，一個坊的居民才能走到一起。根據民國時期的報告，1935年時東大寺坊上回民大約有3,500至3,600戶，共10,600至10,700人<sup>④</sup>，一直是開封市內規模最大的教坊。換言之，當時的東大寺一定具有強大的宗教號召力。

白壽彝的家庭是一個非常典型的穆斯林家庭，母親更是虔誠的穆斯林。據白壽彝本人對筆者講述，只要有時間她就會帶着白壽彝去女寺學習阿拉伯語。「女寺」又稱「女學」，它是中國穆斯林為了滿足婦女學習伊斯蘭教知識、維持宗教信仰的一種發明，而它的發祥地就在與東大寺隔着維中前街相對峙的王家胡同裏。原來，按照伊斯蘭教的規定，婦女不能進清真寺，無法在其中接受以讀誦經文、理解經文為目的的伊斯蘭經堂教育。為了解決這個矛盾，清代嘉慶年間（1796-1820），開封回民在王家胡同創建了由女性教師專為婦女講授經文的「女學」。因為教師會按照教義給前來求學的穆斯林婦女解答有關禮拜、習俗、以至思想方面的問題，她們因而成為伊斯蘭世界裏罕見的「女阿訇」，女學成為婦女專用的「女寺」，從此身兼二職<sup>⑤</sup>。

白壽彝的母親是虔誠的穆斯林，她常帶白壽彝去女寺學習阿拉伯語。「女寺」又稱「女學」，是中國穆斯林的發明。而它的發祥地就在白壽彝所居住過的維中前街的王家胡同裏。清代嘉慶年間，開封回民在王家胡同創建了由女性教師專為婦女講授經文的「女學」。

1932年，上海和南京接連發生了兩起「侮教」事件：南華文藝社與北新書局出版的雜誌與書籍上接連出現侮辱伊斯蘭教徒不吃豬肉的飲食習慣的文章，各地回民奮起「護教」，他們的宗教意識反而得到了強化。白壽彝正是在這個對於伊斯蘭社會發生嚴重偏見的時刻回到開封的回民社會，這促使了他伊斯蘭認同意識的覺醒，並開始了其學術研究方向的調整。

女寺是中國穆斯林社會一道獨特的風景，更是開封回民社會形成了堅固的穆斯林共同體的象徵。白壽彝曾經自豪地提到，他的親戚中有過三位女阿訇。其中一人是他姑姑，能寫一手漂亮的阿拉伯字，所在女寺也離白壽彝家很近。幼時的白壽彝經常隨母親去女寺，跟着姑姑學習阿拉伯語，因為寫得好，還時常受到姑姑表揚。白壽彝在這樣一個擁有悠久歷史、宏大規模、嚴密組織、在中國伊斯蘭的歷史與文化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回民社會中度過少年時代，接受伊斯蘭的啟蒙教育，開封的穆斯林社會給他造就了一種自然的穆斯林意識。然而要將這種意識發展到學問的世界裏，不僅要等到他長大成人，更要有一個引起他深入關懷穆斯林社會的契機。

1932年，上海和南京接連發生了兩起「侮教」事件：南華文藝社與北新書局出版的雜誌與書籍上接連出現侮辱伊斯蘭教徒不吃豬肉的飲食習慣的文章。文章反映出在中國進行民族國家建設的過程中，部分漢人精英對回民堅持自己特殊的宗教信仰和風俗習慣的反感，這給中國的回民造成了極大的精神傷害，各地回民奮起「護教」，他們的宗教意識反而得到了強化。我們注意到，正是在這次民國時期出現的首次「侮教」事件與「護教」運動前後，白壽彝回到了開封的回民社會裏，也開始了他在學術研究方向上的重大調整。可以肯定，白壽彝之所以會在研究方向上出現轉向，正是因為他的伊斯蘭認同意識的覺醒，而促使這種認同意識覺醒的契機，正是因為他在這個對於伊斯蘭社會發生嚴重偏見的時刻回到了這塊他生於斯長於斯的土地上，回到了他的共同體。

## 二 在近代國家的邊緣

很明顯，白壽彝對伊斯蘭具有強烈的認同。但是，如果僅僅強調白壽彝的伊斯蘭共同體意識和責任感，就可能推論出他對其他共同體會有一種排斥心理，然而事實上我們卻無法從白壽彝的身上感受到類似心情。這說明，作為一個穆斯林的白壽彝的自我，首先是一個作為中國穆斯林的自我。刺激白壽彝研究方向轉向的，不是一種自外的意識，而是一種因回民在中國近代國家建設的過程中被不斷邊緣化而產生的危機感。作為生活在開封這座「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中的伊斯蘭共同體的一員，對於這種被邊緣化的危機感，自然更加強烈。

「順河」的本意是沿着汴河兩岸的地區，只要看看宋徽宗時期畫家張擇端所繪的《清明上河圖》就會知道，開封的穆斯林共同體從那時起就從沒有遠離政治中心。開封鼓樓的舊址附近，有一座「三民主義胡同清真寺」。這座清真寺原名鳳凰寺，有人考證說它是宋代為穆斯林出身的官僚所建的官寺<sup>⑥</sup>，它反映出很早以前穆斯林就已進入中國官僚階層的事實。除東大寺外，開封還有鳳凰寺、北大寺、西皮渠清真寺、文殊寺街清真寺等四座古老的寺院，因為資料的限制，無法確認這些「古寺」的具體建造年代。但是據明代文獻資料記載，當時住在鳳凰寺、西皮渠清真寺周圍的居民基本上都是中國土生土長的穆斯林——「回子」<sup>⑦</sup>。它反映出，從明代初年起回民已經進入政策決定層次的事實。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黃河決堤，回民為了堵住水門不惜拆下東大寺的建築材料保衛開封城。水災過後，道光皇帝下令修復東大寺，並揮筆寫下

「護國清真」四字。這四個大字至今仍掛在東大寺的牆頭，與出身於此的原新華社社長穆青所題「東大寺」匾額相對，形象地反映出開封伊斯蘭共同體與歷代國家政治權力之間的共生關係。

然而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中國建設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進程使回民不斷感到被邊緣化的危機。清末民初的革命家，將自己的建國主張從「驅除韃虜」變到「五族共和」，然後又從「五族共和」變到「中華民族」，民族與國家之間的等號愈劃愈清晰。尤其在30年代，發生於東北邊疆的「偽滿洲國建國」和西北邊疆的「回民叛亂」（實為維吾爾），讓愈來愈多迷信國民國家體制的政治家與知識精英對漢以外的文化集團產生偏見和抵制情緒。儘管南京國民政府對1932年在上海、南京發生的兩次「侮教」事件作了較為嚴厲的處理，但是1936年4月在北平又出現了類似的「《世界晚報》侮教事件」。這些發生在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的事件說明，包括中國的政治家和知識人階層在內的中國社會裏，逐漸蔓延開了一種在近代國民國家的體系中，文化也必須統一於主體民族文化的情緒。

二十世紀初期，為了在中國實現民族國家的形式，大量回民知識份子曾經主動呼籲不要將回民看作漢族以外的民族集團。針對漢與回在文化上的差異，他們沒有提出放棄自己的伊斯蘭教信仰，但是主動提出了如何使伊斯蘭文化對發展中華文化作出貢獻的問題<sup>⑥</sup>。然而，30年代中國社會在對文化與民族、國家關係的定位中，卻對回民的伊斯蘭文化進行直接攻擊。這種社會偏見，使回民不得不再次考慮穆斯林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

關係，甚至有人開始考慮在國民國家體系中自己是不是一個有別於漢族的特殊的民族共同體的問題。這件事反映在開封，就是30年代開封回民社會中發生的一系列教派分裂和對抗事件，這些事件使開封的伊斯蘭共同體數度出現分裂的危機。

在離東大寺不過數百米的王家胡同深處，還有一座「王家胡同清真寺」。1989年得到修繕的王家胡同清真寺，與東大寺的中國傳統式建築風格迥然不同，禮拜堂選用的是阿拉伯式的圓屋頂。據開封市伊斯蘭教協會會長李文章介紹，白壽彝的家族在40年代已改入王家胡同清真寺的坊上。與白壽彝同一宗族的白壽志，1998年時擔任王家胡同清真寺教坊的「社頭」（就是由教坊內穆斯林共同推選出來的理事）。事實上，王家胡同清真寺正是在30年代開封回民社會的教派分裂中，從東大寺分裂出來的一個年輕的清真寺。王家胡同清真寺建成於1937年，從教派上來說屬於依赫瓦尼派（即新教），而東大寺屬於格底目派（即老教）。

「依赫瓦尼」之意為兄弟、同胞或朋友，「依赫瓦尼」派是十九世紀末受阿拉伯地區瓦哈比運動的影響，由中國甘肅省的東鄉族阿訇馬萬福等人倡導、形成的中國伊斯蘭教教派。它自稱「遵經派」，提倡「憑經行教」、「遵經革俗」，要求穆斯林「一切回到《古蘭經》中去」，如婦女要戴蓋頭，參加社會活動要嚴格遵守教法教規。他們提出遵從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的《古蘭經》的精神，主張建立平等的教坊間關係，反對鋪張浪費、披麻戴孝、哭喪、游墳點香等風俗習慣。

「依赫瓦尼」實際上是因反對在西北地區回民社會中形成的伊斯蘭教門

只要看看宋徽宗時期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就會知道，開封的穆斯林共同體從那時起就從沒有遠離政治中心。清代道光皇帝下令修復東大寺，並揮筆寫下「護國清真」四字，形象地反映出開封伊斯蘭共同體與歷代國家政治權力之間的共生關係。

東大寺具有奉行與中國傳統文化共存方針的傳統，明代萬曆十四年(1586)曾經樹立「古制連班永尊」的巨大石碑，以表示堅持傳統、抵制其他學說的信念。1908年，河南省第一所以回族子弟為對象的回民學校——養正學校，就由著名的王浩然阿訇創建於東大寺，它同時教授學生伊斯蘭教的知識。

宦制度而形成的<sup>⑩</sup>，故被稱為「新興教」、「革新派」。在並不存在「門宦」的開封地區，「依赫瓦尼」提倡「憑經行教」、「遵經革俗」、「一切回到《古蘭經》中去」的口號，其內容理所當然地讓人聯想到清算漢文化對於伊斯蘭教徒日常生活影響的內容。而被稱為老教的格底目派，則主張一如既往地按照傳統的信仰方式履行穆斯林的基本責任。

開封「依赫瓦尼」教派的歷史，可以追溯到1917年。這一年，跟隨馬萬福學經的馬廣慶從甘肅歸來，開始在開封傳播「依赫瓦尼」學說，20年代初期掌握了對文殊寺街清真寺的控制權，使這裏逐漸變成開封城「依赫瓦尼」教派的據點<sup>⑪</sup>。此事激起了其他教坊的反對，原屬文殊寺街清真寺的反對「依赫瓦尼」的教友，在無法奪回控制權的情況下，不得不於1923年脫離文殊寺街清真寺，建立了格底目派的洪河沿清真寺<sup>⑫</sup>。30年代有人要在開封最大的清真寺東大寺推行「依赫瓦尼」學說，因而引起激烈爭論，教派之爭又起。東大寺坊上信奉了「依赫瓦尼」學說的教友與東大寺分裂，獨自建立了王家胡同清真寺。除王家胡同清真寺外，仿照文殊寺街清真寺建起的北門大街清真寺，也是1933年由僅僅相距半里地之外的北大寺中分裂出來的「依赫瓦尼」派教友所建<sup>⑬</sup>。

30年代開封的教派之爭，表現了在當時的國民國家建設中出現的文化歧視中，中國穆斯林對自己與中國文化之間關係的定位上的焦慮。但是在這場教派之爭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二十的開封回民改投「依赫瓦尼」派<sup>⑭</sup>。東大寺的教長洪寶泉親自用阿拉伯文撰寫《明真釋疑》，明確表達了反對「依

赫瓦尼」教派的意志。東大寺具有奉行與中國傳統文化共存方針的傳統，明代萬曆十四年(1586)曾經樹立「古制連班永尊」的巨大石碑，以表示堅持傳統、抵制其他學說的信念<sup>⑮</sup>。提倡「憑經行教」、「遵經革俗」、「一切回到《古蘭經》中去」的「依赫瓦尼」在開封之所以會遇到巨大阻力，是因為這個看似非常宗教化的命題，實際上意味着對中國文化的疏遠。這對於生活在開封這座「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中的伊斯蘭共同體來說，其實是一個無法真正實現的命題。

開封和西安、洛陽、北京、南京、杭州並列為中國的「六大古都」，戰國時的魏，五代的後梁、後晉、後周，以及北宋、金等王朝都定都開封，孔子和孟子也在這裏留下過足跡，蔡邕、蔡文姬、阮籍等文化名人誕生在這裏，北宋時開封成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科舉史上第一次殿試和最後一次會試都在開封舉行。1954年以前，開封市是河南省的首府，近代這裏誕生了河南省最早的大學、師範和女子師範、報紙、圖書館、博物館、劇團、劇場、廣播局、電報局、郵電局、電話局等等。白壽彝就曾是河南省最初的大學——中州大學<sup>⑯</sup>文史系的學生。

在白壽彝出生的清代末年，開封已經陸續出現新式學校。新式學校面向社會招收學生，除文史之外還教授自然科學方面的知識，不同於傳統的以家族為單位的私塾。1908年，河南省第一所以回族子弟為對象的回民學校——養正學校，就由著名的王浩然阿訇創建於東大寺裏<sup>⑰</sup>。回民學校與一般新式學校不同的是，它同時教授學生伊斯蘭教的知識。然而，白壽彝的父母卻沒有送孩子到這裏上學，

而是聘請先生，在自己家裏開設了私塾。這件事說明，在這樣一個與中國傳統文化有着千絲萬縷聯繫的開封城裏，回民原本重視學習中國的傳統文化。白壽彝的母親不識字，但在窗外聽私塾先生講課，居然默記下《三字經》，然後教給還沒上私塾的白壽彝<sup>⑩</sup>。

1916年，七歲的白壽彝開始在私塾學習。據白壽彝講，他一生曾經遇到過三位私塾先生，啟蒙老師是晚清秀才鄧先生。鄧先生的教育方法是要學生反反覆覆、死記硬背四書五經，白壽彝稱鄧先生的教育方法為他打下了中國傳統文化素養的堅實基礎。繼鄧先生以後來到白家私塾的是一位晚清拔貢呂先生。呂先生強調理解能力的重要性，讓學生嘗試解釋各種古文的內容。出身回民的呂先生指導年僅十一歲的白壽彝完成的第一篇作文題目「過者務當改」選自科舉試題，而白壽彝沒有提起呂先生指導他學習《古蘭經》。在白壽彝十三歲的時候，私塾老師又換成了凌先生。凌先生雖然熟悉自然科學，但在最大的功課語文上，仍然是讓學生通讀和理解中國的古代經典。

根據白壽彝外甥女巴秀芝阿訇的介紹，筆者在開封找到了白壽彝長兄白壽康的長孫——當時已五十歲的白崇仁。據白崇仁介紹，他有三個弟弟：白崇義、白崇禮和白崇智（故人），如果再有一位弟弟降生，家中給他準備的名字是「白崇信」。「仁、義、禮、智、信」，這個由朱熹弟子陳淳整理出來的儒教思想根本，已經扎根在開封城回民的倫理道德體系裏，滲透到了他們的日常生活中。如果理解了這一點，不僅可以理解在30年代為甚麼更多的開封回民不肯輕

易接受「依赫瓦尼」學說的現象，更可以理解在中國建設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進程中被邊緣化的事實給他們帶來的精神苦痛。

### 三 寬容與認同

據白壽志推測，白壽彝與母親去過的女寺，應該是教經胡同女寺，當時也是東大寺的女寺之一。教經胡同貫穿草市街和北上街之間，離維中前街只有三百多米。教經胡同的名字，源於中國歷史上最大的猶太人集團定居於此並在此地建立教會的故事，因猶太人吃牛羊肉時必須挑去牛羊足筋的習慣而得名。以前在中國猶太教也被稱為「挑筋教」或「一賜樂業教」（以色列教），清代以前教經胡同稱為挑筋胡同，以後挑筋慢慢被唸成教經。

開封猶太人的足跡可以追溯到北宋真宗年間（998-1022），據說當時有五百名猶太人以朝貢的名義來到開封並定居下來。1163年，他們在開封建了猶太教堂，明清時人們也將猶太教堂稱作清真寺<sup>⑪</sup>。開封猶太人的人口，幾乎從來沒有超過一千人，然而它卻有着一千年的歷史。這說明，歷代王朝都沒有使用暴力強迫他們放棄自己的文明。正是因為這種寬容，反而促使他們接受了中華文化的要素。據說，1420年一位猶太人被明朝皇帝賜姓為趙，這是最初得到中國名字的猶太人例子。明清時代，也有猶太人出任知縣、參將、刑部郎中等官職，還有人考取了進士<sup>⑫</sup>。從猶太教堂遺留下來的明代正德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他們當時已經開始用儒學的概念解釋猶太教教義。另外，在傳教士所

開封猶太人的足跡可以追溯到北宋真宗年間，歷代王朝都沒有使用暴力強迫他們放棄自己的文明。明清時代，也有猶太人出任知縣、參將、刑部郎中等官職，還有人考取了進士。正是因為這種寬容，反而促使他們接受了中華文化的要素。從猶太教堂遺留下來的明代正德碑的碑文中，可以看到他們當時已經開始用儒學的概念解釋猶太教教義。

白壽彝以開封城中具有多種文化、是一塊多種文化共存的土地為榮，並為猶太人共同體的消亡而惋惜。相比起猶太教，白壽彝對開封城裏的基督教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對基督教沒有留下甚麼好評，這是因為他自己直接體驗了開封的基督教會對於異己文化和思想的不寬容。

畫的猶太教堂的立體圖上，也能看到康熙親書「敬天助國」的匾額，說明居住在開封城裏的猶太人已經接受了中華文化中有關「天」的內容。

開封猶太人共同體消失的原因，首先是與天災有關。黃河洪水泛濫，數次席捲開封，猶太教堂曾於1451年、1642年、1851年、1860年四次遭受黃河洪水的襲擊，前兩次水退之後，人們集資重建了教堂，康熙年間來到開封的法國傳教士還曾描繪教堂重建後的雄姿<sup>②</sup>。然而，畢竟人數過少、經濟實力有限，在最後一位猶太教士於1800年去世<sup>③</sup>後，共同體失去了最後的精神約束力量，於是慢慢走向了自然消亡。在十九世紀兩次遭到洪水襲擊之後，他們不但沒有能力再建教堂，教堂的土地也於1912年賣給了天主教會。

從開封猶太人的歷史中也可以看出，生活在開封這座中國歷史文化名城中的人們，更能理解和適應中國傳統的王朝體系在對待其他文明存在的問題上的寬容態度。我們可以注意到，在中國的猶太人中最後更多的人不是同化於漢人社會，而是被吸收到了伊斯蘭共同體中。由於猶太教與伊斯蘭教在生活習慣上有接近之處，生活在中國的猶太人曾被稱為「藍帽回回」。一位曾於1642年訪問南京的外國傳教士在他的著作中記錄到，當時南京僅有的四戶猶太人都已改信了伊斯蘭教。雖然我們無法確認開封猶太人最後是否也都改信了伊斯蘭教，但是曾為開封猶太人居住區中心的教經胡同，之後變成了穆斯林的集中居住區，卻是不爭的事實。1929年白壽彝考上了燕京大學國學研究所的研究生，遇到了中國猶太人研究的開山祖師陳垣。當陳垣知道白壽彝是開封來

的回民時，居然一度認定白壽彝為猶太人的後裔。

白壽彝雖然沒有發表過直接研究開封猶太人社會和歷史的著作，但毫無疑問，他一直在關注這個問題。1998年夏天在接受筆者拜會時，他曾用很多時間談及開封猶太人的故事。他以開封城中具有多種文化、是一塊多種文化共存的土地為榮，為猶太人共同體的消亡而惋惜。尤其令白壽彝扼腕的是：猶太教堂裏有四本猶太經書，包括兩冊「羊皮古經」，後來都被天主教傳教士掠奪到了歐洲。相比起猶太教，白壽彝對開封城裏的基督教的態度截然不同。他對基督教沒有留下甚麼好評，這是因為他自己直接體驗了開封的基督教會對於異己文化和思想的不寬容。

開封基督教的歷史，可以追溯到明朝崇禎元年(1638)。當年，意大利耶穌會教士開始在開封組織教會<sup>④</sup>。但是，與伊斯蘭教、猶太教傳入中國之後，逐漸接受中國傳統文化成分，利用中國傳統文化的命題、邏輯推理以及倫理觀來闡釋教義不同，羅馬教皇針對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明令禁止信仰者同時保持中國傳統習慣，禁止傳教士利用中國傳統文化思維，也就是通過中國人能夠聽得懂的語言進行傳教。到了清朝康熙年間，這種不許教徒接受一切儒家教義的做法威脅到了清朝的統治基盤，康熙皇帝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開始禁止基督教在中國的布教活動，開封城裏的天主教會就在很長一段時間裏消失了蹤影。

二十世紀初，在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槍炮聲中，基督教重新回到開封。此時來開封的不再只是天主教系統，還有基督教系統的聖公會、美國

的南浸禮會、循禮會、內地會等。從1910年代到30年代，這些教會在開封先後建立了培文學校(男子)、華美學校(女子)和光豫中學(男子)、靜宜女子中學(以上為天主教系統)，濟汴中學(男子)和施育女子中學(美國南浸禮會所辦)，磐石中學(男子)和培德女子中學(循理會所辦)，聖·安德烈中學(聖公會所辦)等許多學校。

1924年十五歲的白壽彝進入聖·安德烈中學。根據與白壽彝同年代進入濟汴中學的趙聖城的回憶錄〈讀書六年的濟汴中學〉記載<sup>29</sup>，當時開封城裏的許多教會學校，至少基督教系統的教會學校，在教育制度與教育方法上有許多相似之處<sup>30</sup>。濟汴中學除了收信徒學生，也接受一般人家的孩子入學，在學費上卻有差別。信徒的孩子一個學期的學費為十六圓(僅僅繳納住宿費和伙食費)，其他學生是三十二圓(學費十六圓、住宿費和伙食費十六圓)。從此可知，並非所有人都是為了基督教信仰才送孩子到教會學校，白壽彝來到這裏的目的是為了學習英語<sup>31</sup>。

教會學校對學生的管理非常嚴格，根本不讓學生接觸外面的世界。比如濟汴中學，學生一律寄宿，每月只可以在一個星期六回家一次，但必須於當天晚飯前返回學校報到，並且嚴格禁止參加各種政治和社會運動。這種對學生思想的控制，引起了一直生活在一個信仰自由的空間裏的白壽彝的反感。尤其是教會學校絲毫不顧學生原有的宗教信仰，要求學生每天早晚兩次禮拜，讀習《聖經》，這更引起了出身穆斯林的白壽彝的反感。第一學年結束後，白壽彝看到一篇發表在上海某家報紙上的文章。這篇文章指出，西方列強辦教會學校的目的，

在於控制中國的教育主權、控制中國國民的思想。白壽彝對這篇文章產生了極大共鳴，下定了退學的決心。但是當他以學校伙食不符穆斯林飲食習慣為理由提出退學時，校方甚至答應給他單開伙食加以挽留，加上白壽彝又考慮到父母盼子成龍的心情，他才留了下來繼續學業，但是三年的課程只用了兩年便畢了業。

從白壽彝對待開封城裏的猶太人和基督教會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白壽彝身上同時集中了兩種精神：既有作為穆斯林對自己信仰的虔誠，更有作為開封人對於其他文化的寬容。而這樣兩種精神之所以能夠同時存在於一個人身上，說明白壽彝已經將一個寬容的社會形態：人們可以具有各自不同的宗教信仰和思想意識形態的社會，看作是一種當然的社會常態。他對基督教學校的反感，也正是出於他無法容忍基督教學校對其他文化及思想的不寬容。如果我們不刻意從白壽彝是穆斯林這樣一個層面來對他進行關注，就可以感覺出，在白壽彝的思想深層中其實蘊藏着最為徹底最為典型的中國文化基因。他看待任何事物的目光，在一個穆斯林之前，首先是一個中國人。而身為穆斯林的白壽彝之所以能夠如此自然地認同中國文化，不是因為他在中國文化的壓迫下放棄了自己的宗教信仰，而恰恰是因為中國具有允許其他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共同體共存的寬容的文化傳統<sup>32</sup>。

不可否認，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有脫離傳統、失去寬容心，通過暴力強迫異己對自己進行認同的政權。但是顯而易見，一個政權失去寬容的時候，也就是它失去了自信的時候，只有在這個時候，他們才會通過暴力強

在白壽彝的思想深層中蘊藏着最為典型的中國文化基因。他在一個穆斯林之前，首先是一個中國人。他之所以能夠如此自然地認同中國文化，是因為中國具有允許其他不同宗教、信仰或文化共同體共存的寬容的文化傳統。但是顯而易見，一個政權失去寬容的時候，也就是它失去了自信的時候，這時候，他們才會通過暴力強迫其他不同宗教、信仰。



在開封順河區，距離白壽彝生活過的維中前街不過數百米的二馬路有一套小洋樓，門前一張牌子寫着「國家主席劉少奇逝世之處」。通過二馬路來到南教經胡同，坐落着崇禎元年所建的天主教堂。教堂圍牆已被改造為數家商店和飯店，其中一家是「清真朝鮮冷麵」。以維中前街為中心，在半徑不超過四百米的地區內，歷史與現實、文化與政治渾然同在，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清真朝鮮」，多種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組成了一道奇妙的風景線。

迫其他不同宗教、信仰、文化共同體、甚至個人認同自己。中國建設近代國民國家的政治進程之所以會給中國穆斯林造成危機感，是因為這個政治進程強迫中國的穆斯林在他們本來並不感到矛盾的二者中只能夠認同其一：要麼中國，要麼伊斯蘭；要伊斯蘭就邊緣化，要中國就放棄伊斯蘭。而這種強迫認同之所以恰恰發生在30年代，也正是因為在這個年代裏「中華民族」遇到了最大的挑戰。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就在30年代「侮教」事件之後，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東北和北京地區相繼組織起了偽滿洲國「回教協會」和「中國回教協會」。這個事實說明，愈是暴力的強迫認同，反而更容易引起離反心理。

#### 四 結 語

開封市順河區裏，在距離白壽彝30年代生活過的維中前街不過數百米的二馬路上有一套小洋樓，門前有一張牌子，上面寫着「國家主席劉少奇逝世之處」的字樣。通過二馬路來到南教經胡同與白壽彝長期生活過的維中前街之間，這裏坐落着崇禎元年所建的天主教堂，開封市天主教協會也設在其中。教堂的圍牆已經被打開而改造為數家商店和飯店，其中一家打出「清真朝鮮冷麵」的旗號。以維中前街為中心，在半徑不超過四百米的地區內，歷史與現實、文化與政治、精神的追求與經濟的欲望渾然同在，伊斯蘭教、基督教、猶太教、「清真朝鮮」，多種文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組成了開封一道奇妙的風景線。然而開封城裏的人們，誰也沒有也不

會以此為奇。白壽彝和開封的故事告訴我們的，首先就是在中國傳統的社會環境下，具有不同文化形態的人們能夠和諧地共同生活在同一個地域裏。

具有不同文化形態的人們之所以能夠在同一個地域中共存，其前提條件就是因為這些人們沒有將文化與政治聯繫在一起。在開封城裏可以發現，比起「回族」這個稱呼來，無論是穆斯林或者非穆斯林，更多的人都更願意稱呼或者被稱呼為「回民」。很明顯，開封的市民，包括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儘管他們的宗教信仰不同，但在日常生活中都同樣感覺不到區別「民族」的必要性。事實上，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的國度，歷來都不是所有的人都對「民族」有清醒的認識和強烈的認同。正是因為這種不去積極認同「民族」的傳統，才使得具有各種不同文化的群體和個人能夠長期和平相處。到了近代以後，這種傳統就更加顯出了它在維護多民族統一國家形態上的意義，因為在近代以來的國民國家理論的影響下，對「民族」的認同被和對國家的認同聯繫在了一起。

包括白壽彝在內的許多中國歷史學者，並不認同將「民族」與國民國家重疊在一起的近代國民國家理論。正是在一個具有不同文化形態的人們能夠和諧生活、彼此並不從「民族」上區別他人的社會環境中，白壽彝才能夠實現他的二重忠誠：作為一個穆斯林和作為一個中國人。正因為這種二重的忠誠，白壽彝也許最能體會到：文化等於民族、民族等於國民國家的公式，並不適合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實際。

## 註釋

① 筆者曾經四次拜訪白壽彝先生，第一次為1997年12月27日，第二次為12月30日，第三次為1998年9月8日，第四次為9月11日。

② 柯文(Paul A. Cohen)著，佐藤慎一譯：《知的帝國主義——オリエンタリズムと中國像》(東京：平凡社，1998)，頁21。

③ 秦惠彬：《中國伊斯蘭教與傳統文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頁64-66；馬娟：《唐宋時期穆斯林蕃坊考》，《回族研究》，1998年第3期。

④ 盧振明：〈開封回教譚〉，《禹貢》，第七卷第四期(1935)。

⑤ 水鏡君：〈淺談女學、女寺的興起與發展〉，《回族研究》，1996年第1期。

⑥⑩⑪⑫ 胡雲生：〈開封市伊斯蘭教清真寺〉，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河南省開封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開封市文史資料》，第十輯(1990)，頁226；250；244；255。

⑦ [明]景況：《如夢錄·街市紀》。

⑧ 保廷樑：〈宗教改革論〉，《醒回篇》(東京，1908)，頁31-40。

⑨ 門宦是西北地區的甘肅、寧夏和青海地區回民社會中一種普遍的教團組織形式。主要是由伊斯蘭教神秘主義教派蘇非派的領袖，將中國封建禮法制度導入伊斯蘭教信仰體系而形成的。門宦的領袖可以世襲，對所屬成員保持絕對的權威。

⑬ 開封市民族事務委員會：〈東大寺阿訇——趙永清〉，《開封文史資料》，第十輯，頁360。

⑭ 穆德全、胡雲生：〈開封的回回民族〉，《開封文史資料》，第十輯，頁287。

⑮ 中州大學，前身是經河南省臨時議會決定於1912年創立的河南留學歐美預備學校。當時類似的學校全國僅有三所，其餘兩所分別是北京的清華和上海的南洋學校。中州大學於1927年改名為河南中山大學，1930年再改名為省立河南大學。早期畢業生中有范文瀾(歷史學家)、馮友蘭(中國哲學家)、姚雪垠(小說家)、周而復(小說家)等有名的文化界人士。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後，先後改名為河南師範學院、開

封師範學院、河南師範大學等，1984年恢復為河南大學。

⑯ 郭宜甫：〈憶養正學校〉，《開封文史資料》，第十輯，頁330；陳廷良、王惠民：〈淺議河南回民教育〉，載山東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中國回族教育史論集》(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1991)，頁160。

⑰ 魯丁(白壽彝)：〈從《三字經》說到歷史教育〉，載《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頁1288。

⑱ 關於中國猶太人歷史的詳細資料——猶太教的來源、教義，猶太人遷入中國，以及開封猶太教教會的沿革，主要記載於開封猶太教教會的三塊石碑上——明代弘治二年(1489)的「重建清真寺記」(弘治碑)、明代正德七年(1515)的「尊崇道經寺及鏤空記」(正德碑)、清代康熙二年(1663)的「重建清真寺碑」(康熙碑)。

⑲ 魏千志：〈中國古代猶太人的歷史貢獻〉，《史學月刊》，1995年第3期。

⑳ 榮振華(Joseph Dehergne)、萊斯利(Donald Daniel Leslie)著，耿升譯：《中國的猶太人》(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㉑ 同上書，頁8-9。

㉒ 孟紫坪：〈開封市天主教會概述〉，《開封文史資料》，第十輯，頁42-44。

㉓ 趙聖城：〈讀書六年的濟汴中學〉，《開封文史資料》，第十輯，頁186-88。

㉔ 在筆者1997年12月30日對白壽彝先生的採訪中，這一點也得到了證實。

㉕ 劉雪英：〈白壽彝教授傳〉，載《白壽彝史學論集》(下)，附錄，頁1297-98。聖·安德烈的校長在入學考試時問白壽彝為何選擇教會學校，他回答說：為了學習英語，為了利用英語這一工具看世界。

㉖ 關於其原因，請參照拙著：《多民族國家 中國》(東京：岩波書店，2005)中關於中華文化的締造者其實是由周邊進入中原的異民族統治者的論述部分。